

人間佛教與東亞大乘佛教的現代化轉型

張文良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眾所周知，中國、日本、韓國的佛教構成東亞大乘佛教圈，三國佛教不僅歷史淵源深厚，而且在近代幾乎同時面臨著西方文化的劇烈衝擊，曾經歷過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的科學理性思潮成為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作為傳統文化組成部分的大乘佛教如何因應時代的變化，在現代性面前如何證明大乘佛教的合理性和佛教存在的正當性，就成為東亞各國佛教界共同面對的時代課題。

人間佛教運動，從消極意義上說，是中國佛教界救亡圖存的一環，是解決佛教生存危機的一種努力；從積極意義上說，則是中國佛教界兼顧繼承和創新、完成現代化轉型努力的一部分。以佛光山人間佛教運動為代表的的人間佛教理念和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使得大乘佛教這一古老的思想體系和實踐體系不僅在現代性

衝擊面前屹立不倒，而且如老樹發新芽，為當代社會貢獻了豐富的精神財富和正面的社會效應。這一偉大實踐證明大乘佛教即使是在科學理性暢行天下的時代，仍然有其旺盛的思想活力，仍然可以給現代人提供精神支撐和文化滋養。

與中國佛教的人間佛教運動相並行的是日本和韓國佛教界的現代化轉型。在佛教理念的創新方面，日本淨土宗僧人、政治家椎尾弁匡提出的「共生」理念和親自推動的「共生」社會運動，深刻影響到日本傳統佛教在戰後的走向，「共生」也超越佛教的範圍，成為日本文社科學界流行度最高的詞彙。而在家佛教居士團體創價學會宣導的「第三條道路」則力圖通過政治運動改造日本社會，創立一個兼顧效率和公平的「佛法民主主義」的世界。創辦創價學會的公民黨作為日本執政黨之一，在日本政壇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在教育方面，日本傳統的宗派人才養成機構在戰後紛紛轉型為面向社會的綜合性大學。佛教系統的高等學校有 63 所之多，如東京的駒澤大學、武藏野大學、京都的佛教大學、龍谷大學、花園大學等，這些大學不僅為佛教界培養了大量人才，更為社會輸送了大批人才，為日本戰後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貢獻卓著。同時，日本寺院利用寺院的有利條件（在市中心區域、有大量閒置房屋等）興辦大量的幼稚園、小學、中學，由於這些學校歷史悠久、校風純正，因而成為學生們爭相選擇的優質學校。在佛教學術研究方面，日本最大的人文社會科學社團就是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該會會員的一半左右有僧人資格。可以說，日本僧人在日本佛學研究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韓國最大的傳統佛教團體是曹溪宗。曹溪宗源自中國六祖惠能，在韓國歷史上經歷諸多磨難。在朝鮮王朝的數百年間，曹溪宗

僧人被禁止進入城區，僧人被迫避居山林。直到 1895 年，僧人才被允許進入城市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曹溪宗擺脫殖民地時期日本佛教肉食妻帶的影響，走上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曹溪宗的主要活動是培養僧才、從事佛學研究和弘法利生。在文化教育方面，早在 1906 年就創辦了綜合性現代大學——東國大學，現設有 13 個學院和 11 個研究生院，是韓國最著名的私立大學之一。此外，還有佛教團體興辦的威德大學、金剛大學等綜合性大學。同時，曹溪宗的寺院還興辦大量的養老機構，在社會養老領域創出了佛教養老的模式。

在東亞大乘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共同點，即中日韓的佛教都受到來自社會外部的強烈衝擊，如中國近代的寺產興學狂潮、日本戰後的農地改革運動（寺田被充公）、韓國基督教的迅猛發展等。面對來自外部的衝擊，佛教界不得不思考如何通過改革而迎接挑戰，開創新局。因為維持現狀、抱殘守缺只有死路一條，嚴峻的現狀逼得佛教界必須進行觀念的革新和實踐上的變革。

日本著名宗教學者島園進將佛教界開展教育、文化、慈善事業的努力，界定為佛教的「再社會化」的過程。隨著東亞社會進入現代社會，佛教作為一種古老的傳統受到衝擊帶有某種必然性。在傳統的東亞社會中，佛教深刻嵌入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在日本的江戶時代，寺檀制度下的寺院不僅負責居民的喪葬儀式、墓地管理，而且還擔負著戶籍管理等行政職能。此外，還通過「寺子屋」承擔基礎教育功能，通過施粥、施藥等發揮著社會救濟功能。而隨著現代國家行政體系的完善，寺院承擔的教育、社會救濟、戶籍管理甚至喪葬儀式等，都被相關的行政部門所接管，這

些社會功能被從寺院剝離出來。這實際上是寺院的去社會化的過程。寺院的去社會化也意味著寺院在現代社會體系中的邊緣化。東亞傳統社會的寺院是地域的教育中心、文化中心、甚至是經濟中心（如廟會），但在現代社會，寺院似乎只是觀光中心，成為現代人懷舊、休閒的地方。人間佛教運動和日本韓國佛教界的種種努力，實際上是力圖讓寺院重新回到社會體系中，回到人們的生活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佛光山在都市的道場普遍開設「社會大學」，面向社會各個階層展開「社會教育」，滿足不同年齡層學習、進修的需要。這似乎印證了島園進的判斷，即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意味著佛教的「再社會化」。

東亞社會的現代化在不到 100 年的時間裡，給東亞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傳統社會裡，寺院是將農村村民、城市居民連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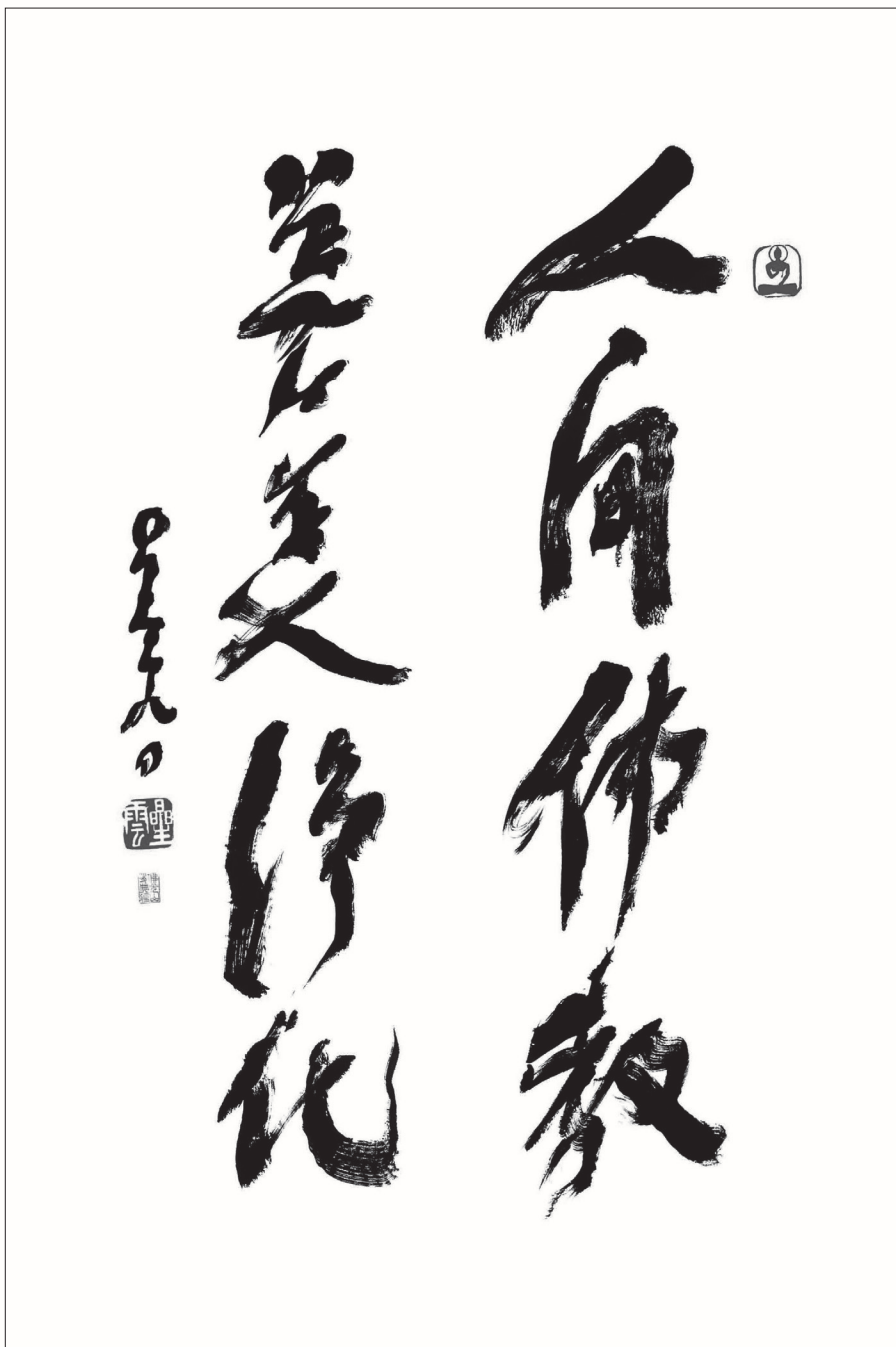


佛光山人間大學南區聯合成果發表會於南台別院舉行，各區老師、學員代表近 350 人參與。（施峻廷 / 攝）

起來的重要場所。無論是否信仰佛教，大眾通過臘八節、燈會、廟會等形式，獲得一種情感共鳴和身分認同。而現代化在追求城鎮化、工業化的過程中，打破了以往以寺院為紐結的文化共同體，年輕的一代雖然獲得物質的滿足，但卻成為飄蕩在都市的無所皈依者。日本社會學家將這樣的社會稱為「無緣社會」，即社會成員失去了建立在共同體基礎上的情感連接和精神依託。原本企業可以作為一種傳統共同體的替代物，但現代企業遵循效率至上原則，資本的冷酷讓從業者感受不到任何人之為人的尊嚴感、一體感、歸屬感。在這種情境下，寺院完全有可能重新成為人們精神和情感的棲息地和加油站。疲憊的人們可以在寺院獲得片刻安寧和精神賦能，再重新走向社會去打拼。

如日本著名企業家、京瓷集團創始人稻盛和夫在企業陷入困境時，曾到日本禪宗妙心寺去短期出家，在寺院得到精神的滋養之後，帶領企業走出危機，成為一代經營之神。在晚年，稻盛和夫毅然出家，成為妙心寺僧人。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在日本航空公司遇到危機時，不顧高齡重新出山，擔任日航總裁，只用 2 年時間，就將日航帶出經營危機。稻盛和夫的人生選擇，可以說是東亞大乘佛教現代化轉型的一個典型案例。有出世的情懷又有世間的擔當，既有對佛教精神理念的認同，又有社會責任感和服務社會的格局和才能。

東亞各國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在當代世界格局中所處的位置也各異，雖然東亞佛教同屬大乘佛教系統，但在教理教義和儀軌制度等方面千差萬別。然而，東亞佛教界可以通過廣泛的交流，分享各自在現代化轉型中的成功經驗，共同為大乘佛教在世界範圍的復興做出貢獻。



星雲大師一筆字〈人間佛教善美淨化〉